

“融合之都 从此大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随记

一曲敦睦相亲的咏唱

冯楨

印象中，内蒙古与山西是两种习俗两种风情，草原牧歌、赛马摔跤、篝火歌舞、马头琴漫瀚调、奶茶手把肉……每年的那达慕大会将蒙古风情加倍放大，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最近，市委统战部组织我市文史学者、长城专家赴内蒙古考察调研，当地一位统战部干部激动地说：老家亲人来了，感到分外亲切。他说，晋蒙山水相连，口音相似，习俗相近，人文相通，许多地方都一样的。

一句话一下子把两地人的感情拉近了。

晋蒙之间，山水相连，交往不断，亲如一家。特别是长城沿线的村镇，从庙会到赶集，从过节到唱戏，都是热闹非凡。每逢堡内红火，口外的亲戚们都要赶来，一时间，亲朋满座，笑语喧哗，热闹非凡。

“鸡犬一声闻两省，晋蒙一家好乡邻。大大小小都是亲，墙里墙外满汉情。”这首七言顺口溜，是长期居住在长城内外晋蒙两省(区)、蒙汉、满汉人民乡里乡亲近无间的真实写照。

鄂尔多斯，听起来很“内蒙”，其实也是个民族大家庭。鄂尔多斯地区大多数召庙都供奉菩萨和龙王，充分证明了蒙汉文化的融合。饮食上汉族接受了酸奶、炒米、手扒肉，蒙古族喜欢酸粥、油糕、豆面。汉族在腊月二十三祭灶，蒙古族把传统的祭火也改为祭灶，把时间也改为腊月二十三。

包头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占比极高的山西移民将晋文化带到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大大改变了此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晋文化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元移民文化。

走进包头博物馆，感觉分外亲切，又分外惊奇，因为这里展示的民俗、习俗、婚嫁、葬俗等等，都与晋北一样，几乎看不到草原民族的风俗民情。比如，婚俗与晋北的如出一辙，相亲、订婚、下茶、娶亲、拜天地、回门，样样不差。从墓葬形式、墓室壁画等方面看，葬俗也与汉族差不多。

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内蒙古许多地方的民间艺术、非遗文化，也与晋北特别是大同地区极其相像，吹糖人、拉洋片儿、社火表演、九曲黄河灯阵……连民间游戏也一样。原以为坐腔是大同特有的

民间艺术，却看到包头地区也有。

晋剧是山西热土上产生的地方剧种，随着晋商的脚步进入草原，在内蒙古高原厚土的滋养下，表演形式逐渐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并广泛借鉴京剧、河北梆子等唱腔念白，结合现代场景，形成了如今高亢激昂、特色鲜明，深受老百姓喜爱的剧种。更有意思的是，当年还有一种不成文的民间规则，晋剧在内蒙古的舞台上唱响才算好戏；晋剧演员在内蒙古的舞台上唱红方称名角儿。

原以为，“漫瀚调”是内蒙古的特色艺术，懂音乐的朋友说，漫瀚调在本质上就是蒙汉调，以蒙古族民歌作母曲，融入晋陕民歌风味，“二者合二为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

“二人台”是民间艺人创造的一种传统剧种，在整个晋北及陕北、内蒙古中西部、河北张家口一带已经流传近200年。清末，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商人和百姓“走西口”到内蒙古西部地区，他们带来的家乡音乐文化与当地的蒙古族音乐文化相融合，逐渐形成了二人台牌子曲。晋北民歌也随着“走西口”的人群进入到内蒙古腹地，逐渐由民歌向戏曲转化。“二人台”唱腔曲目《走西口》改编自山西同名民歌《走西口》，其中的山西民歌音乐元素还融入了蒙古族音乐元素。

《走西口》讲述的是过去年代生活在黄土高原贫瘠地区的人们离乡背井，走出西口(今杀虎口)到内蒙古谋生的故事。各地的《走西口》内容相近，曲调却有很大差异。山西小调的《走西口》，以如泣如诉的弦乐音色和细腻落错的复调声部，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一对情人依依不舍的离愁别绪，这里有缠绵悱恻的喃喃私语，更有肝肠欲断的生离死别。

西口路上，不仅有哀婉的哭述，也有铿锵的足音，一代代晋商栉风沐雨、餐风露宿，历尽千难万险，吃尽千辛万苦，走出辉煌的人生大道，也为当地带来巨变。“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包头城就是在乔贵发等众多山西商人手中建起并兴盛的。“一个大盛魁，半个归化城”。大盛魁是当时归化城(呼和浩特)最大的商号。它初设在走西口的重要关口杀虎口，由太谷县武家堡的王相卿和祁县城内人

张杰、祁城村的史大学合伙创办，后移驻归化城。“呼和浩特是一座由多民族组成的融合之城。当年大部分市民都是清代、民国时期走西口来到呼和浩特，从事手工、餐饮、皮毛牲畜、粮药行业的移民，留下‘召城、驼城、买卖城’一说。可以说，晋文化是呼和浩特的根，大南街、大北街是呼和浩特的魂。”一位对呼和浩特老城颇有研究的当地民俗专家如是说。

秦晋之好讲的是春秋时期，晋国和秦国通过政治婚姻的形式结合，相比之下，晋蒙之谊成为一种更广泛、更深厚、更牢固的民族关系。经过长期的杂居、通婚与社会交往，蒙汉民族显现出文化的双向吸收特征，在语言、饮食、衣着、建筑、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多个方面不断相互重塑，民族情感与融合程度进一步加深。

走西口走出了民族之间的融合之路，一茬茬、一代代晋商也走出了纵横欧亚大陆的“中蒙俄万里茶道”。呼和浩特、包头、大同等都是“中蒙俄万里茶道”上的重要节点与货运枢纽，是旅蒙商外出贸易的必经之地，三座城市以及“万里茶道”沿线至今仍保留了大量历史名城、名镇、名村，展现经贸、民俗和不同民族迁徙交流活动的古道线路主体以及相关设施(会馆、桥梁、商号、宗教及民用建筑等)。“南来烟酒糖布茶，北往牛羊骆驼马”。万里茶道以运送茶叶为主，同时兼营皮毛、缎布、盐铁、瓷器等项日用杂货，中原地区大量的手工业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内蒙古地区。服饰装饰、音乐器具、竞技产品、玉器漆器、医药卫生等商品精彩纷呈，商品交换异常活跃，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通畅。这条国际古道纵贯中蒙俄三国，横跨亚欧大陆，繁荣了两个半世纪，在人类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民族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而战争是民族交往的一种

极端方式，也是民族融合的催化剂。晋蒙同处长城沿线，是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的结合部。历史上，北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在该区域内繁衍生息、交往融合，留下了大量极具民族特色的古城遗址、古墓葬、古建筑、金银器、青铜器、碑刻、岩画、雕塑、陶瓷等遗存和遗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多个领域。当然，民族之间也是碰撞不断，大大小小的战争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民族关系。明蒙关系以隆庆和议为转折点，此前，两家关系比较紧张，摩擦、冲突不断。此后，化干戈为玉帛，得胜堡等11处马市率先开市，最终形成了“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的局面，以“通贾”和“互市”的方式使蒙汉民族关系在民族贸易中走向深化。

战争是把双刃剑，对双方的伤害都是很大的。为了规避这种伤害，和亲文化应运而生。和亲政策还是汉高祖时期，一位名叫娄敬的大臣提出来的。汉元帝时，王昭君作为和平使者，远嫁漠北草原，留下昭君出塞的历史佳话。昭君出塞，汉朝与匈奴政权维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局面，迎来“边城晏闭，牛马布野”的太平盛世。董必武题诗《谒昭君墓》：“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从历史的高度，赞美了王昭君为民族团结作出的重要贡献。如今，青冢之前，屹立着董必武所题诗碑。在人们心中，昭君出塞已经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昭君墓也成为民族团结的纪念碑。

阴山作屏，长城如带，草原文明与黄河文明在这里交相辉映，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这里融汇贯通。胡服骑射开启民族互鉴的先河，昭君出塞奏响民族和好的序曲。敦睦相亲的咏唱，从古而今，延绵不绝。



图为大同作家志愿者陪同全国文学报刊联盟主编游览古城。

一次难忘的文学志愿服务

赵永宏

记忆中，作为全国文学报刊界级别较高、规模较大的全国文学报刊联盟会员大会暨“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奖”颁奖会在江西上饶、广东珠海、内蒙古呼和浩特等城市举行。每两年评选一次的内刊优秀文学编辑奖、新锐文学编辑奖、骨干文学编辑奖、致敬·资深文学编辑奖让无数文学编辑脱颖而出，成为行业内的佼佼者。文学编辑发现、造就优秀作家，一些作家的精品力作也由此获得读者关注。全国文学报刊联盟论坛内现的关于期刊、关于文学的独到见解和成功经验又成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为一座座城市点亮文学灯塔。

今年，全国文学报刊联盟会员大会暨“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奖”颁奖会在大同举行。大同市作家协会、大同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众多作家、评论家分外激动，纷纷表示，终于有了一个与文学大咖近距离交流的好机会。成为志愿者，为大会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就是致敬文学的最好表达方式。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发出招募邀请函后，作家、评论家们踊跃报名。最终确定了42名志愿者参与大会的接待工作。从会前嘉宾行程安排、出行提醒，到会中资料携带、会场引导，再到会后陪同、大同作家、评论家们基本做到“精准对接、精细服务”。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民族文学》副主编陈亚军在全国文学报刊主编论坛上向大同作家表示敬意。《回族文学》杂志社社长、主编刘河山表示：“大同的做法值得借鉴，今后我们举办类似的活动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

全国文学报刊联盟会员大会暨“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奖”颁奖会，架起了一座桥梁，一座大同作家与全国知名文学报刊主编、作家沟通交流的桥梁。这是一座“连心桥”，因为文学，让大同作家保持活力，让大同作家再出发。带着感恩之心再出发，文学之路将走得更踏实、更从容。左云女诗人冀利芬被确定为志愿者后表示：“即使自己解决住宿问题，我也不会错过这次机会。”五天的时间，她尽心竭力

地为嘉宾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当左云县文联主席郑建国得知她是志愿者的消息后鼓励她：“只要是左云文学争光添彩，我们全力支持。”左云是“文学大县”，冀利芬说：“我要和这些文学大咖多多交流，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为左云文学贡献自己的力量。”

大同的一些作家、评论家在《诗刊》《星星诗刊》《小说月报》《文艺报》《文学报》《黄河》《山西文学》《诗选刊》《都市》《小小说选刊》等报刊发表过作品。当这些报刊的主编来到大同后，就像好久未见的老朋友会面，他们的交流是很轻松的，名刊主编身上所表现的人格魅力，也值得每一位大同作家学习。交谈中提及的一些名家名篇，总会引起共鸣。当市诗歌研究会会长王占斌谈到陕西诗人阎安的诗作，《延河》副主编刘羿群说：“他是我们杂志社的社长兼执行主编，是一位有情怀的诗人。他的诗可以通过一个人的个体状况折射全部人性的宏大与精致。”王占斌喜欢读阎安的诗，正如喜欢研究八法拳一样，有血有肉有骨气。而刘羿群也从王占斌的武生人生中读懂了他的为人。

我也是一名志愿者，我的服务对象是《山东文学》编辑部主任苏敏和《青年文学》青年编辑耿鸿飞。一位是“85后”，一位是“90后”，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文学的青春力量。在完成了对接工作之后，我为他们准备了“见面礼”。捧着《云冈石窟图片集》，苏敏说：“我喜欢先阅读相关旅行笔记再去目的地，你的礼物为我下次去云冈石窟提供了帮助。”耿鸿飞说：“我大学读的是美术史，这本书真是太实用了。”我心中窃喜，初次相识，竟然心有灵犀。当两位年轻编辑翻看《2023年山西省第九次旅游发展大会会刊》，纷纷表示：“大同，我们一定会再来！”

夜深了，来同嘉宾回到房间休息。市文联党组书记樊青、主席段军山和志愿者们还在讨论着工作。志愿者们说：“为大同文学服务，我们没有一点倦意！”

大同市博物馆馆藏辽金铜镜赏析

大同市博物馆 姬强

铜镜作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政治、文化、经济、社会习俗等诸多方面的现实状况，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是研究和考证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政治、文化、社会习俗等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及考古学价值。多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大同地区出土了较多的辽金时期铜镜，为我们认识和研究辽金时期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辽金时期是大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公元936年，唐大将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今河北、山西北部地区)割让给契丹，从此，云州(大同)被划归辽地。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至此，大同就成为辽代五京(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南京幽州府、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之一。《辽史·

百官志》记载：“辽有五京。上京为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余四京随宜设官，为制不一。大抵西京多边防官，南京、中京多财赋官。”大同一直是辽时重要的军事、经济及文化中心。辽末天祚帝保大二年(1122)，大同为金兵攻陷。金时，大同仍为西京大同府，为金之五京(上国会宁府、东京辽阳府、北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南京开封府)之一。辽金时期，作为陪都的西京大同，不仅是当时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还一直保持着陪都的政治地位，留下了丰富的历史

文化遗存。

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民族游牧文化在此相互碰撞融合，形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铜镜文化面貌。自建馆以来，大同市博物馆通过发掘、征集、采集、民间捐赠等多种途径收藏了较丰富的辽金时期铜镜。从馆藏辽金铜镜的特点看，有的比较典型，有的比较少见，对研究古代铜镜的发展演变及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现象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现甄选部分大同市博物馆馆藏辽金铜镜呈现给读者，以供研究欣赏。

辽八曲云纹铜镜，直径19.9厘米，八曲菱花形，伏兽纽，镜背两条巨龙绕首尾相接，前、后肢伸张，露爪。龙身四周饰八团形状相同的云纹，龙的背鳍、腹甲、鳞片以及细密的肘毛、须发均刻画细致。

辽人物故事镜，大同市四牌楼地下通道出土。直径6.5厘米，圆形，窄素缘。镜背一株结满松果的松树下有两个人，前面的长者持龙头杖，后面有一侍者相随，远处是层峦叠嶂的山峰草木，镜缘处饰一周联珠纹，边缘出一带孔纽。

辽花卉纹铜镜，大同市四牌楼西南地下通道出土。直径13厘米，圆形，纽，花瓣座，座外环绕五朵折枝花卉，柔枝细叶，刻画细密，其外环一周联珠纹，素缘。

辽花卉纹铜镜，直径14.2厘米，

厚0.15厘米。八瓣菱花形，小圆纽，近缘处一周联珠纹带将镜背分割为内外两区。内区以组为对称分布一组折枝花卉及花枝，纹饰纤细秀丽，联珠纹带及八瓣之间有一组花草纹，素缘，缘上用契丹文刻官府印记。

辽人物故事镜，大同市火车站西北出土。直径8.7厘米，圆形，纽，组一前一后，桥水河水流淌，组两侧各有一树，枝叶横生于镜上部。树前各站一人，双手捧物，二人之间有一小兽口衔结带绣球做奔跑状。组上有一凸起的横脊，上有一人双手捧物前行，组上近缘处一长方形框内有“西运司局监造官口”八字铭文，素缘。

金双鱼纹铜镜，直径15.5厘米，圆形，桥纽，素缘。近缘处一周凸起的弦纹将镜背分为内外两区。内区双鱼首尾相近，鱼身肥硕，侧身摆尾，鱼尾向镜纽方向回折，衬以水波纹，外区一周水草纹，流动回旋。

金双鱼纹铜镜，云州区解庄村出土。直径14厘米，圆形，半球形纽，一条凸弦纹将镜背分为内外两区。内区两条鲤鱼首尾相接，环绕游动，插头摆尾，鱼鳞清晰，水波细密；外区饰一周水草纹，素缘。双鱼纹是金代铜镜最为常见的纹饰之一，金代女真人居于今天的松花江流域，江中盛产各种鱼类，鱼是女真人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金史·兵志》中记：“金之

柄上饰有一鹿抬头望月，窄素缘。在金上京博物馆以及河北省迁安市开发区也出土了几乎同样纹饰的铜镜，经考证，此镜主要流行于金代中期。

金许由巢父故事镜，1977年，大同市花园屯采集。直径14.6厘米，圆形，圆纽。镜背纹饰上、下分为水陆两部分，分界处上面平坦微有起伏，下面呈波浪或锯齿状，可能表示河岸。陆地上组左侧有一大树，枝叶繁茂，两侧有山。树左侧一人坐地上，右手弯曲抬至耳部，右侧一人牵牛而行，右手指向许由。水中浪花涌起，中有一花草图案。素缘。

大同历来是多民族融合之地，尤其是辽金元时期，草原民族与汉民族在此生活定居，北方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在此碰撞、交融，呈现出多民族融合的地域特色。从馆藏辽金时期铜镜的风格来看，也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呈现出精致与质朴、柔美与粗犷相互交融的特点，既有中原的纤细柔美，又有草原民族的粗犷豪放，在吸收中原纹饰的同时，又创新出一些新的纹饰。这些纹饰所反映的生活丰富多彩，既有对中原文化的吸取，又具有北方民族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呈现多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整体特征，独具时代及地域特色。

金代人物故事具柄镜，直径8.5厘米，厚0.4厘米，柄长7.1厘米。镜背右侧有一树，枝叶繁茂，伸向前方，树下立一妇人，裙带飘舞，右手执一物指向一捧桃小猴，中间地上有一小动物伏地，天上仙鹤飞于云端，



金双鱼镜



金人物故事镜

